

PATTERNS IN THE DUST —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20

汪熙

主编

艰难的抉择

美国在承认 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

(1949—1950)

〔美〕唐耐心 (N. B. Tucker) 著

朱立人 刘永涛 译

刘永涛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艰难的抉择

——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
(1949—1950 年)

〔美〕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 著

朱立
刘永涛

译

校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Publ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ries Editor: Wang Xi



Patterns in the Dust

—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ancy Bernkopf Tucker (唐耐心)

Translated by: Zhu Liren & Liu Yongtao

Emended by: Liu Yongtao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
1949~1950/[美]唐耐心著;朱立人,刘永涛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汪熙主编)

ISBN 7-309-02287-4

I. 艰… II. ①唐…②朱…③刘… III. 对华政策-
研究-美国-1949~1950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971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3 千

版次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充分利用了已解密的官方档案,特别是利用一些美国在华企业的私家档案,从当时可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中共、国民党、院外集团、教会、商人、传播界、国会和学者以及国务院与白宫等等,对1949—195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影响当时美国政府决策的各种因素。

主 编 前 言

1949年2月7日,有51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杜鲁门总统,要求组织专门委员会对中国形势作一次全面调查研究,并对当时即将倒台的国民党政府进行紧急援助。作为回应,同年2月24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出面,邀集写信人会晤。但事先声明会议记录不得外传(实际出席30人)。在会晤中,艾奇逊说,当时中国的形势扑朔迷离,有如大树在森林中倾倒,尘埃迷漫,要“等尘埃落定后”(until the dust settled),才看得清楚整个形势。这样就搪塞应付了这些共和党参议员的要求。艾奇逊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说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举棋不定的状态。

这本书原名是“尘埃中的模式”(Patterns in the Dust)就是从艾奇逊说的要“等尘埃落定后”这句话引喻出来的。这句话原是美国一句成语,对中国人来讲,作为一个书名很难理解。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译本的书名改成《艰难的抉择》较好,既不失原意,又在文字上较清楚。

论述1949—1950年间的中美关系,最早和较齐备的著作要算美国学者邹谠1963年出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其后,台湾学者梁敬淳在80年代有一系列的专述论文。唐耐心教授一书出版较后,因而有条件充分利用已解密的官方档案,特别是利用一些美国在华企业的私家档案。由于离开当时烟雾弥漫的1949—1950年代已经30年了,“尘埃”应已“落定”,加以事过境迁,让人们更能较平静地回顾往事。特别是历史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禀赋更能较客观地对当时错综纷杂的关系加以梳理评述。

唐教授的书几乎囊括了可以影响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所有方面：中共、国民党、院外集团、教会、商人、传播界、国会和学者以及国务院与白宫等等，并把它们分门别类系统评述。这样我们就能较清楚地看到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和渠道。这种研究取向是较费力的。唐教授采取了这种较费力的研究取向，因而获得了较扎实的成果。

唐教授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注解详明，资料丰富。她用的注解占全书约三分之一篇幅，公私档案及专著与论文目录亦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我们觉得这正是本书的精华之处，所以不遗余力地全部译出并附录原文。这样做确很费力，但更便于有志于进一步研究的读者追溯借鉴，从学术上讲是比较周到的。至于承认不承认新中国，并且后果又如此严重，这是百年来中美建交后，美国人从未碰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著者在这重要的节骨眼上，把在尘埃弥漫中众说纷纭的不同意见，有根有据地罗列出来，从历史上讲是比较郑重的。

全书涉及到很多公私机构及团体名称和人名，我们都尽可能查出它们的正确译名。译者除对个别文字作了一些处理外，一切保持原状。

同我们翻译其他外国著作一样，翻译该书并不表明我们的观点同作者完全一致。当然也并不排斥在有些地方我们同作者持有相同的观点。

汪 熙

1998年4月于复旦校园

原著者中文版序言

自从该书在美国出版十多年以来,关于冷战尤其关于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的文献迅速增多。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里所提出的论点为后来的研究和辩论确定了议题,学者们掂量着就下述内容而出现的新证据和新解释:(1)美国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党统治抱一种更为灵活态度的观点,(2)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可能发展关系的机会,(3)在中国,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平衡,(4)对一个美国国务卿的描绘,他尽管决意要在欧洲发动冷战,但却任凭他对中国的淡漠主导着一项更为宽松的亚洲政策。本书所作出的解释仍然存在争议,但也已经成为理解这一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

有机会通过复旦大学直接向中国读者表述我的观点,这是我久所盼望的。我真诚地感谢汪熙教授和美国研究中心使这件事成为可能。我没有因出版中译本而修改我的原稿,希望它能引起像在英语读者中间所产生的那种争鸣程度。

在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的岁月里,中美关系领域学术界所面临的挑战是努力消除误会和误解,寄希望于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通过彼此间更清晰的认识,采取一些避免昔日的对抗以达到互惠互利的政策。这不是一条轻易可循的道路,却是一条变得日益事关重大的道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变得更为复杂和险峻。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入口处,历史学家有责任提醒他们的读者,美国人和中国人过去在哪些地方犯有过错,以及他们如何能够致力于一个更好的未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必须有机会接触中美关

系文件档案,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官的外交信件和决策备忘录。在美国,相当数量的资料已经被解密,尽管还有许多有待去做。在俄国,这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外交部所公开的案卷为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只是在中国——而且对中国很不利——仍然几乎不可能利用档案研究。如果仅利用美国和俄国的资料来源,人们无法公正地记录这一重要关系的确切历史。然而,只有把自己的外交档案向学者开放,中国才能够对我们已处地位、我们将去何处的解释产生影响,我希望这件事将为时不远。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

1995年9月

序 言

1948年晚些时候，在共产党军队迅猛前进的道路上，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作为此种局势的见证人，美国官员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的方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人卷入了中国的事务——因为蒋介石政府进行反共内战，于是向它提供援助。然而，尽管美国给予武器、弹药、金钱和供应品，国民党的战事却逡巡不前，而且到了1949年便面临穷途末路。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华盛顿是努力援救崩溃中的国民党政权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

哈里·S·杜鲁门总统和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因忙于筹谋冷战外交和应付国内的政治斗争，拒绝对东方的事态发展作出轻率的判断。在试图解释政府对国民党溃败所持的谨慎态度时，艾奇逊把它比作森林中一棵倒下的树：美国将不得不一直等到尘埃落定，然后才可以清楚地展望未来^①。然而，这不像批评家们所想像的是什么无所作为的政策^②；杜鲁门—艾奇逊的消极态度遮掩着他们的认真努力，也就是既评估国际上对一项新的对华政策的反响，又评估美国利益集团和公众对亚洲趋向的转变能否容忍。

在这点上，我探索中国崩溃尘埃中的模式——考察官员们如何认为他们的所见以及他们的可能行为。我分析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反应，把重点放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这项探索在时间上跨越18个月，即从1949年1月（第二任杜鲁门政府就职及中国的事态发展预示内部冲突即将解决）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使合理的分析至此突然终止）。本书分析包括政府的一系

列行动：努力弄清美国人的意见（因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与共产党中国还是与国民党中国保持关系——对美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评估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的机会；估计公众和国会主张给予政策制定者多少自由。最后，在调查了美国对华政策对华盛顿的盟友和敌人的影响以及仔细分析了国民党生存的可能性之后，迪安·艾奇逊和国务院设计了一项战略。

我试图对1949及1950年对华政策制定者的活动加以再现的想法，主要得益于学者们现在可以得到的大量原始资料。美国国务院最近已不再将截至1949年底的大部分文件列入保密范围，并在《对外关系汇编》中收集了大量重要文件。该文件汇编已印到1951年。中国方面虽说没有类似的资料汇编，但驻美“大使”顾维钧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文件及口述历史谈话录已编成巨著。该著作引人入胜，使读者至少洞察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其衰落的岁月中的一些活动。我也不胜幸运，获准利用许多私有的收藏品（社团的和个人的），这些收藏品迄今尚未被美国东亚关系领域的研究者们所利用。

在学者、档案保管员和个人的种种帮助下，我的工作在各阶段都变得更有趣味，更令人愉快。这些个人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事件，在30年流逝之后犹铭记不忘，不禁令人惊异。前《上海大美晚报》总编辑高尔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伯特和已故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都慷慨地让我共享他们的回忆录和文件。其他耐心倾听我的问题并试图帮助我探索的人有：菲利普·C·杰塞普、柯乐博、埃弗雷特·凯斯、约翰·梅尔比、亨利·利伯曼、沃尔特·沙利文和魏德迈将军。工商界常常拒绝我的询问，或丢失我的信件，但非同寻常的是，例如博伊西阶式蒸发器公司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欣然让我利用他们的档案，并提供工作空间乃至复印文件的特别待遇。涉外索赔清偿委员会执行主任弗朗西斯·T·马斯特森在百忙中腾出时间介绍该代理机构的业务，并为我从远

方的仓库获得文件资料。正如其他研究者可以证实的那样,我要特别感谢专门档案保管员为使人们易于取得他们所拥有的资料而做的努力。国会图书馆原稿部、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分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原稿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尤为突出。我还享有优待,例如新英格兰学院参考图书馆馆长安·鲁宾逊邀请我利用她家的闲房。

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学会、国际研究协会/福特基金会和科尔盖特大学研究委员会的财政支援也帮助本书得以完成。《太平洋历史评论》慨允重印我稍加修改过的《未必有希望的和平》论文作为第6章。此外,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的戴比·贝尔及科尔盖特大学的罗萨利·希亚姆和帕特·瑞安的熟练打字,使我得以早日完成手稿的几番修改。

在写作的岁月中,我的同事们挤出时间并提供他们的知识来讨论我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1978年6月,我有幸参加讨论美国东亚关系的基斯科山会议,从一些同行的论文及讨论者那里检验了我的许多假设。虽然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的结论,不过我特别得益于迈克尔·亨特、沃尔多·海因里希斯、拉里·韦斯、斯蒂文·戈尔茨坦和沃尔特·拉费伯的洞察和鼓励。我也要感谢海因里希斯、乔治·C·赫林、詹姆斯·W·莫利和安德鲁·内森等教授,因为他们不辞辛苦地阅读了全部原稿,并力主在文体和内容上进行修改。类似的事还有,一小批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如约翰·德埃米利奥、威廉·麦克劳克林、杜安·塔南鲍姆和苏珊·斯通·翁,用8个多月的时间阅读了我的著作草稿,并提出有益的意见和给予使人振奋的支持。

当然,最深厚的情义是最难以表示感谢的,无论什么言词也不能有力地描述多萝西·博格、威廉·E·洛伊希腾伯格和布鲁斯·塔克在使本书得以问世方面所做的艰巨努力。洛伊希腾伯格教授向我指出:没有任何研究工作因太巨大而不能进行,也没有任何一

篇散文因得到高度评价而不能修改。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多萝西·博格帮助我学会提哪些问题，并且不倦地指导我寻找答案。如果没有她一贯提供的支持和安慰，这项工作会变得更加难以完成。我的丈夫布鲁斯往往在我艰难的时刻慷慨地提供他的编辑意见、他的力量和他的耐心。对于他们的贡献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目 录

主编前言

汪 熙

原著者中文版序言

〔美〕唐耐心

序 言

第一章	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开始	1
第二章	国际影响:欧洲和亚洲的观点	20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政策:出乎意外的途径	43
第四章	国民党衰落:希望忽隐忽现	64
第五章	院外援华集团:虔诚的少数人	87
第六章	传教士:未必有希望的和平	110
第七章	在华贸易:终止还是开始?	123
第八章	新闻记者和传播媒介:时间推移,看法改变	146
第九章	公众、国会、学者:寻求限度	168
第十章	国务院和白宫:决策没有实现	189
结 语		212
注 释		226
参考文献目录		422

第一章

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开始

1949年1月，一个空气清新的上午，迪安·艾奇逊就任哈里·杜鲁门的第三任国务卿，就在此时，长期代表国民党中国的蒋介石则从民国总统宝座引退。这两件大事同时发生，它极为明显地预示着中国问题将要占用艾奇逊在国务院的岁月，并使他更多地卷入亚洲事务和考虑重订美国对华政策。艾奇逊后来回忆道：“蒋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我刚刚到任，他的垮台一事就压在我身上了。”^①事实上，到艾奇逊担任国务卿职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权力的可能性一度颇为遥远，而此刻则变得近在眼前。1949年初，国民党一方面再次企图寻找谈判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它的显要人物纷纷逃跑，在台湾岛上寻找庇护所。美国人不得不决定：他们是陪同蒋介石流亡呢，还是承认北京新当局。

迪安·艾奇逊和哈里·杜鲁门总统都不想作出这个棘手的决定。对政府来说似乎只有付出代价——而且没有任何好处。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人将意味着切断美国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联系。它还意味着否认一个亚洲社会的革命活动和拒绝一个经过长期追求而获得的和平。然而，摈弃所谓的自由中国人而同一个公开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权打交道，有引起国内党派骚动的危险。况且，对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政治上已趋成熟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选择需要一番使人不安的意识形态调整。

其次还有，杜鲁门和艾奇逊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前景，即把时间

和注意力用于重新审查美国在华的利益。当1949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几乎经常地全神贯注于苏联在欧洲的挑战及共和党在国会的反对情绪。中国已陷入内战多年，而且在此之前，它已证明是一个虚弱而任性的盟友。他们二人对中国政治斗争的了解是何等之少，而且的确知之甚少，这问题也许无法解决，因此最好把精力用在别处。杜鲁门总统在外交事务领域感到不自在，所以欣然同意国务卿的信念：对美国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永久重要性的边缘地区。

但在1949年，不管他们多么不需要中国，杜鲁门和艾奇逊发现它还是不可忽视的。国民党统治的瓦解过程不会是平静的、与战后政治动荡无关的。相反，像演京剧那样，当不协调的锣钹声把漫不经心的听众的注意力引到舞台上时，毛泽东的枪炮强迫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亲眼目睹一个政府和一个时代寿终正寝前的垂死挣扎。国民党无法继续维持他们的军事优势或对人民权利和生计的虚伪关心。革命军队从蒋介石手里夺取了权力，并允诺按照共产党的意志改造社会，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举措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在这一事态发展中，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面临着美国安全可能遭到的威胁。至于危险的严重程度，则视胜利者是中国的爱国者还是受苏联强国操纵的傀儡而定。

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超出冷战竞争，并且涉及到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例如，中国虽说离欧洲遥远，但在英国政治家们的谋划中占有特殊地位。伦敦指望在华的投资以及同中国的贸易会有利可图，以便帮助稳定风雨飘摇中的经济。艾奇逊感到必须考虑到英国在中美关系天平上的利益，在他看来，英国的困难仅仅在美国自己的困难之下。

名义上西方式中国政府的解体也对美国的亚洲朋友产生使人不安的潜在影响。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扩张中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经受着新一轮的开拓。美国

拥有占优势的影响力，但苏联由于地理缘故而保持更明显的存在。杜鲁门和艾奇逊担心：在中国，一个宣称为民主体制的倒台将向其他亚洲国家人民表明：不是这个制度本身不起作用，就是美国不遵守它救援苦难盟友的承诺。日本人的身份迅速由敌人变为盟友，所以特别在他们中间，对华盛顿的信赖是无可置疑的。况且，在东京就像在伦敦一样，经济上的需要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中国市场吸引了日本工商业者，尽管这种接触含有政治风险。

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知道，政治风险并不限于国外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公民已不对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抱幻想，因为这种和平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安全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消除全球的紧张局势，公众越来越指责民主党的政治家们要对国际事务的混乱状态负责。共和党故意给这种抱怨火上加油，趁机提出所谓失去中国的论调，以证明杜鲁门、艾奇逊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对共产主义持软弱态度。

在这些已知的压力下，迫在眉睫的国民党崩溃使国务卿及其工作人员投入不愉快的、然而最终不能避免的工作：分析美国在东方的目标。在1949年1月至朝鲜战争爆发的18个月里（这些岁月后来使这场战火和“麦卡锡大屠杀”混乱地呈现出白热化），艾奇逊实际上设计了一项对华战略并着手执行它。正当批评家谴责国务院无所作为以及政府的浮夸言词，似乎表明已有政策等待国外的事态发展时，国务卿开始着手制定他的计划，并寻求对该项计划的支持。他一面争取盟友，一面又预计到会遇到反对，于是便谨慎从事；他自己没有定见，对情况缺乏了解，因此进展并不顺利，但由于公众普遍漠不关心，所以他仍感到泰然。依他的观点看，似乎有充足的时间慎重行事：美国并没有承诺将自身投入到日后岁月的狂热之中，讨论的要旨暂时仍然悬而未决，外交颇为灵活，足以向多方面发展。

早在1949年初，国务院在艾奇逊领导下，试图对国内政界对